

從語內翻譯看古今文學改革： 1920-30 年代中國的「古文今譯」

李 馥 名 *

提 要

近代中國的「翻譯」一直是備受矚目的研究主題，涉及跨文化、跨語言，甚至全球化、殖民主義等概念。然而，近代中國不僅大量翻譯外文著作，也積極嘗試將自身的古代文本轉為現代白話，即所謂的「古文今譯」。古文今譯在 1920、30 年代掀起熱潮，成為文言、白話短兵相接的爭議焦點，滲透文學創作、圖書出版、語文教育，乃至方言采風，具體而微白話文學運動的核心討論，且對於日後華人社群的文言教材及教育方式帶來深遠影響，實值得探討。

就整體翻譯研究而言，近代中國的古文今譯現象也針對 Roman Jakobson 所謂的「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提供了可貴的案例思考，有助於我們反思翻譯語言的異同界線問題及翻譯文本之間的關係。本文除探討語內翻譯的相關概念，包括與其他文化的古文今譯案例比較以凸顯近代中國的特殊性，最主要將根據

本文於 113.03.01 收稿，113.12.24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2409_(86).0002

幾種具體案例——包括郭沫若、顧頡剛，胡適、黎錦熙，及魏建功、錢玄同、何容等人的幾次討論——解析 1920、30 年代的中國人如何將翻譯運用在傳統文化保存，並藉以思考何為固有傳統價值，以及如何進一步透過翻譯反思語言現代化的各種可能。

關鍵詞：古文今譯、語內翻譯、近代中國翻譯、近代中國語文教育、近代中國語言改革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d the Reform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Translating Classical Text into Modern Language in 1920s-1930s China

Lee, Fu-Mi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in modern China has long been a significant research topic, encompassing concepts of cross-culture, cross-language, and even globalization and colonialism. Modern China not only translated a vast number of foreign works but also actively attempted to convert its own classical texts into modern vernacular language—a process known as “translating classical texts into modern language.” This trend surged in the 1920s and 1930s, becoming a focal point of controversy between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languages. It permeated literary creation, book publishing,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en dialect collection, serving as a core discussion of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i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nese communities. Therefore, it is a topic worthy of exploration.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phenomenon of translating classical texts into modern language in modern China also provides valuable case studies for Roman Jakobson's concept of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It provides a critical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iginal text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including comparisons with similar cases in other cultures to highlight the uniqueness of modern China. The primary focus is on analyzing key cases, such as the discussions by Guo Moruo, Gu Jiegang, Hu Shi, Li Jinxi, Wei Jiangong, Qian Xuantong, and He Rong, to examine how the Chinese scholars of the 1920s and 1930s used translation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study also aims to reflect on the inherent traditional values and explore the broader possibilities for language moderniz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

Keywords: modern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modern China translation, modern China language education, modern China language reform

從語內翻譯看古今文學改革： 1920-30 年代中國的「古文今譯」

李 馥 名

一、引 言

中國自晚清以來大量引進外文著作，使「翻譯」成為重要的媒介方式及文化產業。所譯文本跨及各語種、文類及時代，方法上則從晚清林紓的口語文言轉譯、嚴復的「信達雅」原則，到五四時代以後更加題材廣泛且系統化的翻譯實踐及理論辯證，反映出近代中國求新求變的試驗精神，並引伸諸多探討。

只是現有討論多集中在跨文化的翻譯現象。事實上，近代中國不僅大量翻譯外文著作，也積極嘗試將古代文本轉為現代白話，即所謂的「古文今譯」。古文今譯在 1920-30 年代掀起熱潮，成為文言、白話短兵相接的爭議焦點，滲透文學創作、圖書出版、語文教育，乃至方言采風，具體而微白話文學運動的核心討論，且對於日後華人社群的文言教材及教育方式帶來深遠影響，實值得研究。

況且，就整體翻譯研究而言，近代中國的古文今譯現象也提供了可貴的案例思考。類似這樣的古文今譯在翻譯學上一般被稱為「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於 1959 年由俄國結構語言學家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所正式提出，與語際翻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符際翻譯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並列為三種主要的翻譯方式。¹ 根據 Jakobson 的定義，語內翻譯其實也可以被理解為

¹ 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On Translation*, ed. Reuben Arthur Br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232-239.

「改換措辭」(rewording)，指的是「在相同語言內以不同的文字符碼進行翻譯」；² 相對的語際翻譯是透過「不同語言的文字符碼加以翻譯」，而符際翻譯則是「以非文字符碼系統翻譯文字符碼」，³ 如以繪畫、音樂表現文字內容（雖然如下節所說明的，後續一些學者傾向更廣泛的跨媒介定義，包含口語到書面的轉寫）。然而，Jakobson 並沒有特別強調語言的「相同」與「不相同」究竟該如何界定，加上他直指語際翻譯為「真正的翻譯」(translation proper)，文章也是以語際翻譯的討論為主，使得另外兩種翻譯如 Derrida 所批評的，幾乎只有「象徵意義」(figurative sense)，⁴ 引發不少後續爭議，尤其是以描述性定義為本，針對語內翻譯的討論；而同文化內部的古今翻譯更是其中最主要的論述焦點，所涉及的問題即為古今語言的同與不同，也就是語言的「歷時性差異」(diachronic varieties)。

近代中國的古文今譯無論就語言本身特性或歷史背景而言都有其案例特殊性。首先，中文的古典書寫形式使用時期長，從現存成書最早的文本如《詩》、《書》、《易》等五經算起可上溯至約西元前十一世紀，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紀初語言革命，但部分文本持續保留在官方教育體系中乃至今日；歷代各朝雖有風格上的不同，但使用者受過一定程度的古文訓練便可通讀。相較於其他文明，希臘文的發展狀況最可供參照；其現存最早文本上溯至西元前八世紀的《伊里亞德》、《奧德賽》史詩，古文形式雖有變動，但大體至二十世紀仍為官方語言。然而，這兩種語言的近現代演變卻有不小的差異。簡單來說，古希臘文在現代希臘史上的地位較文言文在現代中國史上的地位要來得高；古希臘文在十九世紀被視為復興希臘文化的關鍵憑藉，其受法語、德語影響的仿古形式「純正希臘語」自十九世紀中起大致為官方正式語言，遲至 1976 年方才廢止。故希臘文雖然同樣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口語現代化的拉鋸取捨，但其古文形式受到批判的程度遠不及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古文。加上希臘語中古今的彼此關係也與漢語的古今不同，涉及古今語是否同屬一種語言的問題，連帶影響這樣的古今翻譯該被視為語內翻譯或語際翻譯的判定（詳見下節討論）。而如下文所討論的，近代中國古文今譯的風行正是源於當時知識份子亟於推

² 同前註，頁 233。

³ 同前註，頁 233。

⁴ Jacques Derrida, "Des Tours de Babel." In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ed. and trans. Joseph F. Graham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74.

廣並標準化現代白話文的歷史背景，對於古今語的關係也多有討論，乃至於積極實驗以現代口語書寫全面改寫、取代包含上古經典文言文的可能性；所反映的是他們對於古典文本的矛盾心態，以及對於新興翻譯文化的理解與應用。

其次就語言的現代改革而言，土耳其語的發展狀況則可供參照，該語學者針對語內翻譯的討論成果也最為具體豐碩。配合世俗化、歐洲化的政治、文化轉向，土耳其在 1928 年由官方正式推動語言改革，以西方的拉丁字母取代原先鄂圖曼帝國伊斯蘭傳統的阿拉伯語及波斯語拼寫（即「鄂圖曼土耳其語」），漸次改換語法、句型、用詞等語言習慣。同一時間，土耳其作家大量以現代語言翻譯以鄂圖曼帝國時期為主的各種作品，甚至譯者自己先前以鄂圖曼土耳其語所寫的原始創作。但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土耳其與中國在古文今譯操作上的明顯差異：土耳其語的現代改革其實多少涉及從阿語、波斯語轉譯到拉丁拼寫的語際翻譯，因此很多學者並不承認現代土耳其的這種文本譯寫為嚴格定義的「語內翻譯」；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二十世紀初的當時，很多譯者便已刻意迴避以「翻譯」指稱自己的再創作行為，而偏好「改寫」、「整理」、「簡化」的用詞概念。⁵ 後者這種迴避翻譯用詞的文化現象有幾種可能的解釋，包括時人以保存舊有文化為念之餘透露出對翻譯的不信任感，⁶ 以及古今語言其實有許多共享元素，特別是詞彙，使受到翻譯的原始語言並未顯得太過陌生，因此缺少一般人認知中的「翻譯感」，而更接近於文本改寫。⁷ 相形之下，近代中國的古文今譯不僅因為所譯文本的成書時間跨度更長、文本類型更多（包含文學作品以外的所謂正典經文），譯者更是毫不避諱指稱自己的作品為「翻譯」，甚至群起討論，使翻譯的理論性成為古文今譯活動的核心議題之一。他們對於翻譯的信任，顯示以跨文化情境類比古今傳承的野心與盼望，以及對於古今語言互通、轉化的實驗精神，其心態及論述值得學者思考。

本文將先就語內翻譯的定義做整體討論，並以此為基礎分析近代中國古文今譯的案例特點。具體案例首先將聚焦 1920、30 年代的中國人如何將翻譯運用在傳統文化保存，並藉以思考何為固有傳統價值，以及如何進一步透過翻譯反思語言現代

⁵ Asli Kalem Bakkal,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Has No Name in Turkey: Conceptual Crowdedness i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transLogos* 2, no.2 (2019), pp.58-59.

⁶ 同前註，頁 58。

⁷ 同前註，頁 64。

化的各種可能。案例包括第「三」節聚焦郭沫若、顧頡剛兩位古文今譯先行者如何在 1920 年代分別以《詩經·國風》及《尚書》為例，各就文學及歷史學術的角度實驗並討論古文化的保存與復興，以思考古文翻譯的可行性。第「四」節論證 1930 年代的古文今譯如何在文化、教育界受到廣泛運用，以致於促成文言文的文法系統化，並影響五四以後的古文選本標準及系統教育，甚至進一步的白話寫作訓練。最後的第「五」節則根據同樣是 1930 年代的案例——魏建功、錢玄同、何容等人在 1932 年《國語週刊》上針對杜甫詩的翻譯考題討論——聚焦古文本的方言採集及有聲念讀的多元可能，以探究古文今譯如何進一步挑戰「白話」的現代意義。故在議題上，本文除回應翻譯研究中關於語內翻譯的討論，具體則涉及現代中國的語言改革、語文教育，與風俗採集；古文今譯為貫穿此間的實作方法，呈現文言、國語及方言在此背景下多音的對話關係。

就語內翻譯的概念討論而言，本文則參照其他的文化案例——尤其是土耳其及希臘——主要回應翻譯與整理、改寫的關係，旁及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的認定差異，以及古文讀解與今文書寫——即原始文本與目標文本——孰輕孰重的現實操作問題。這部分將先在以下第「二」節做整體探討，再據後文案例各自加以回應。

二、語內翻譯的學理問題

如前所提及，語內翻譯因其對於跨文化界線的挑戰，很適合用以檢視翻譯的概念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探討近代中國古文今譯現象的根本。故本文有必要先就語內翻譯如何挑戰翻譯定義的背景做簡要的說明探討，以從學理角度解釋「古文今譯」的意義特點。

自 Roman Jakobson 提出包括語內等三種翻譯類別，後續已有不少學者加以回應以進一步細緻化翻譯的學理定義。但其實一直到差不多 2000 年以前，語內翻譯均長期受到忽視，翻譯學者 Mona Baker 在其 1998 年出版的翻譯學百科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中甚至直言就他所知「並沒有什麼針對語內翻譯

及符際翻譯的專門研究」。⁸ 直到 2007 年方有 Karen Korning Zethsen 根據前人如翻譯學家 Gideon Toury、哲學家 Ludwig Wittgenstein 等人的相關論述提出較直接的修正概念，並在學界引起不小的共鳴，⁹ 包括 Aage Hill-Madsen、Asli Kalem Bakkal 等翻譯學者都在此基礎上加以檢視並做了整體性的理論回顧及反思，¹⁰ 而後續討論更幾乎沒有不加以回應者。故本文討論亦將以 Zethsen 的翻譯定義為基礎，提供近代中國的實際案例加以檢視歷時性（diachronic）語內翻譯的特點。

本節無意就 Zethsen 等人的討論做重複性的概述，但需簡單釐清此一系列論述的幾個核心問題。就語內翻譯而言，其問題出發點在於翻譯與改寫的界線，以及語內翻譯與語際翻譯的差別。細節討論則涉及「跨文化」、「跨語言」是否為翻譯的必然元素？而所謂的「跨」，或者「轉換」（transfer），及相關的「原型」（prototype）跟「同義」，或者「對等」（equivalence），又是指什麼？且這些概念是否足以適切描述翻譯的現象特質？所跨越的文本——所謂的「原始語言」（source language）跟「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所構成的文本——彼此之間究竟又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最後整體來說，語內翻譯在這樣的觀念體系裡究竟處於什麼位置、提供了什麼樣的思考？

首先關於跨文化及跨語言的必要性。Jakobson 以其語言哲學的角度出發，將語際翻譯視為「真正的翻譯」，使跨語言，進而跨文化，幾乎未受質疑成為翻譯的基本條件跟預設。當然，後續有許多學者紛紛提出質疑，提醒我們語言間的界線往往並非基於任何語言學上的特性，而是政治社會層面上的認定習慣，且各文化內部又往往存在不止一種「子文化」（subcultures）。其例屢見不鮮，中國各地區的族群、方言差異即為一例，本文最後一節也會略微涉及。不過 Zethsen 及 Hill-Madsen 在其合著論文中亦不否認跨文化概念的價值，認為與其將翻譯視為語言系統的代碼轉

⁸ Mona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xvii.

⁹ 見 Karen Korning Zethsen, "Beyond Translation Proper—Extending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TR* 20, no.1 (1st semester 2007): 281-308; 及 Karen Korning Zeths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 Attempt at Description," *Meta* 54, no.4 (Dec. 2009), p.795-812.

¹⁰ 見 Karen Korning Zethsen and Aage Hill-Mads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ts Place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Meta* 61, no. 3 (Dec. 2016). pp.692-708; Asli Kalem Bakkal,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Has No Name in Turkey," pp.48-69.

換，莫如將文化本身視為「意義系統」或「概念系統」，而翻譯即為意義、概念系統的文化轉換，以淡化有形的國族界線跟語言限制。¹¹

不過即使是文化翻譯，操作上難免涉及語言切換，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跨語言」在翻譯上的角色呢？Zethsen 在其由語內翻譯出發的論文中提醒我們翻譯學者 George Steiner 如何回應 Jakobson 的理論定義。Steiner 在其 1975 年的重要著作 *After Babel* 裡強調翻譯之於語言及溝通的關鍵性，認為任兩人之間的語言都不盡相同，因此任何形式的溝通都離不開詮釋行為（an act of interpretation）。¹² 這般著重詮釋性的觀察角度讓我們看到語內翻譯及語際翻譯之間更強的共通本質，畢竟 Jakobson 所說的語內翻譯的「改換措辭」跟語際翻譯尋求同義語言的挑戰是根本一致的，也就是如何用一種語言表述另一種語言。

但如此又延伸出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原型」(prototype)跟「等同」(equivalence)。用一種語言表述另一種語言意味著有一個原型文本被詮釋為與之對等的文字，但詮釋文本要與原型文本具有什麼樣的等同程度才足以被視為翻譯呢？廣義來說又與文本改寫有什麼分別？事實上，不少學者均坦承翻譯並不是一種「等同導向的文本再造行為」(equivalence-guided text reproduction)，而是自由度更高的文本創造 (free text production)；¹³ 畢竟翻譯無論如何都只能做到部分等同，以使原始語言的意義在透過另一種語言表述之後合情合理，卻永遠無法直接代表原始文本。¹⁴ 因此，相較於「等同」，有不少學者更傾向用「相似」(similarity)或「相關」(relevance)這樣更有彈性的概念來描述原始文本跟翻譯文本的關係；甚至如 Andrew Chesterman 所提出，且為 Zethsen 所沿用的，強調由原始文本所「形成」(derived，或「源於」原始文本)的「差異性相似」(divergent similarity)，¹⁵ 以修正更先如 Toury 所堅

¹¹ Karen Korning Zethsen and Aage Hill-Mads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ts Place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pp.701-702.

¹² Karen Korning Zethsen, "Beyond Translation Proper," p.286.

¹³ Karen Korning Zethsen and Aage Hill-Mads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ts Place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p.698.

¹⁴ 同前註，頁 698-699。

¹⁵ 見 Andrew Chesterman. "On Similarity," *Target* 8, no.1 (1996), pp.159-164; Andrew Chesterman. *Contrastive Functional Analysi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12-16; Andrew Chesterman. "Similarity Analysis and the Translation Profile,"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 no.1 (2007), pp.61-62.

持的「轉換」(transfer、transference)概念，因為「轉換」意指某種意義成分從原始文本被「挪動」到目標文本，但翻譯其實涉及了程度頗高的產出、創造，而不是單純的意義挪移。¹⁶ Zethsen 這個著重創造性的定義也因此包含了更多以往被歸類為「改寫」的翻譯創作，如前引土耳其案例，關鍵在於兩文本的相似、相關程度，而程度的判別則多少取決於後文將會討論的目的、動機。

最後，Karen Korning Zethsen 提出了自己對於翻譯的學理定義，認為翻譯應包含以下條件：

- 某段時間曾經存在或現仍存在的原始文本。
- 目標文本透過轉換成形於〔或「源於」〕原始文本（造就以另一種語言、文本或媒介所構成的新產物），亦即原始文本與目標文本間具有一定相關的相似性。
- 上述關係可以表現為各種形式，非僅限於等同概念，需視目標文本的形式目的而定。¹⁷

看得出來其中第一點對於原始文本的定義已極其寬泛，且強調時間性而非地域性，迴避了跨文化的用語概念，很明顯是考量了語內翻譯的情況，包括如古文今譯這樣的案例。第二點即為前文所說明的原始文本與目標文本間的關係，著重的是「形成」／「源於」的轉換方式，以及兩者間「相關的相似性」(relevant similarity)，同時凸顯文本媒介的多元可能及其新創特質，所謂的「新產物」。

然而就語內翻譯來說，這般寬鬆的翻譯定義又會產生另一個問題：既然語內翻譯確為「翻譯」，那它與語際翻譯的界線又在哪裡？尤其當跨文化、跨語言的區別在寬泛認定之下幾乎不再具有定義上的嚴格意義，我們是否還需要語內翻譯跟語際翻譯的劃分呢？如 Christos Karvounis 便就希臘古、今在文化背景上的差異及語言的歷史流變等特點，論證其古經典的現代翻譯應為語際翻譯，而不為語內翻譯；其

¹⁶ Karen Korning Zethsen and Aage Hill-Mads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ts Place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p.704.

¹⁷ Karen Korning Zethsen, "Beyond Translation Proper," p.299.

語言的相似性僅有歷史文化的延續關係，兩者非屬同一個共通語言。¹⁸ 這樣的說法自有道理，但若以本文的案例加以對照，結果仍較傾向 Karen Korning Zethsen 所指出的：「語內翻譯及語際翻譯的方法差異主要在於程度及動機上的問題，而不是類別差異」。¹⁹ 也就是說，語內翻譯的認定會隨個別案例而有條件上的不同，尤其取決於語言特性、歷史發展，甚至譯者及學者個人對於語言異同的劃分傾向。

同屬歷時悠久且區域文化影響力大的文明語言，中文在近代的古文今譯提供很好的案例參照。相較於白話希臘文在現代以前從未真正形成與古希臘文（Ancient Greek）相對的語言體系，²⁰ 中文現代標準語的「官話」最遲在十七世紀初明朝初立時即官方化，並開始有不少以官話為本且流通廣泛的文學作品問世，如各種明清章回小說。²¹ 雖然這時期的官話與現代國語仍稍有不同，但差異甚微，一般現代讀者毋須翻譯即可直接閱讀明清時代以官話為本的文字作品，顯示中文的文言與白話並非全然僅有歷時性差異，亦為共時（synchronic）存在的語言系統。而自五四時代白話運動以來，這般文言與白話的差距主要便被理解為書寫形式的不同，甚至是標準化的程度差異，而非兩種語言，也就是本文第「四」節所論胡適、黎錦熙等人的基本信念；畢竟有別於古希臘文，中文的文言文一直是以書面語言的形式存在，並非獨立而完整的自然語言系統。

不可否認地，照部分當代學者的論述，口語的書面表達涉及媒介轉化，多少帶有 Roman Jakobson 所說「符際翻譯」的特點。尤其像民俗學者 Elizabeth Fine 即認為任何現場表演的詮釋本身其實嚴格來說都涉及翻譯，書面版本只是其中一種表達的方式。²² 以本文所討論的1920、30年代中國來說，不少地區仍方言盛行，即使

¹⁸ Christos Karvounis,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Greek," Katja Abels, Silvia Hansen-Schirra, Katharina Oster, Moritz J. Schaeffer, Sarah Signer, Markus Wiedmann, eds. *Re-Thinking Translator Education: In Honour of Don Kiraly's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Berlin: Frank & Timme, 2022), pp.209-210.

¹⁹ Karen Korning Zeths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pp.808-809.

²⁰ Christos Karvounis,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Greek," p.211.

²¹ 關於明清以來官話與文言、白話的關係，見 Shang Wei, "Writing and Speech: Rethinking the Issue of Vernaculars in Early Modern China," in Benjamin A. Elman, ed.,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1919* (Leiden, Boston: Brill, 2014), pp.254-301.

²² 見 Elizabeth Fine, *The Folklore Text: From Performance to Pri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89-112。關於晚近符際翻譯的討論整理，參見 Kay L. O'Halloran, Sabine Tan and

是標準國語的書寫亦需特別訓練；故從方言而書寫，甚至是方言經國語而書寫，都替近代中國的語內翻譯增加了複雜度，與語際翻譯、符際翻譯都彼此關聯，而這也是本文最後兩節所會討論的。但總而言之，即便是方言與國語的距離，或者國語書寫之於文言文，學界自五四時代以來大致傾向以漢語族下的方言關係來加以討論這幾個語種，而非將之視為個別的「語言」系統（國語則以其前身的官話方言來討論），而這多少也是不同方言間一直共享書寫語言的關係。²³ 這般與前述希臘文的案例差別最主要即為歷史發展因素，甚至是譯者、學者主觀認定及動機的不同。而本文所討論的1920、30年代即為近代中國此現象發展的關鍵階段，口語與文言兩種書寫形式互為關聯的標準化歷程更決定了古文今譯的操作與論述走向，甚至反過來作為精緻化白話書寫的技术手段；這尤其是相對於其他文化的古文今譯較為特殊的一點，也是本文末兩節的討論核心。

上述的主觀認定與動機亦可就 Zethsen 的翻譯定義做進一步的說明，也就是上述定義的最後一點。Zethsen 除指明原始文本與目標文本間的關係超出等同概念，基於其自身對於專業-非專業轉譯的研究興趣與關懷，亦特別提出目標文本翻譯「目的」的考量。這項條件其實已超出學理範圍，涉及非專業人士甚至社會大眾如何看待翻譯的行為活動。因為普遍來說，非專業人士及社會大眾對於翻譯的認定往往受到產業習慣的影響，也就是對於翻譯帶有更強烈的專業化印象或想像，以致於限縮了翻譯的指涉範圍。²⁴ 二十世紀初土耳其的古文今譯即為一例，包括譯者自己都傾向以「改寫」、「整理」、「簡化」等詞彙指稱他們的行為活動，即使不少後世學者視之為語內翻譯的案例之一。²⁵

Peter Wignell,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s Resemiotisation: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Signata* (Jul, 2016), pp.199-229。

²³ 官話方言及其他漢語方言如閩、粵、吳、客等的現代研究及分區即自五四時代開始，早期語言學家包括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均有相關研究。參考丁邦新：〈漢語方言分區的條件〉、〈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166-208。

²⁴ Karen Korning Zethsen and Aage Hill-Mads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ts Place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pp.693-695.

²⁵ Asli Kalem Bakkal,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Has No Name in Turkey: Conceptual Crowdedness i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transLogos* 2, no.2 (2019): pp.58-59.

相較之下，如下文所討論的案例，近現代中國的古文今譯除部分學者、作家，更多是由非專業翻譯的素人所群起呼應，並為教育、文化、社會各界所廣為接受，乃至於使翻譯做為一種演練操作的重要性遠高於譯作成品本身。知識權力階層的翻轉更意味著譯作間並不存在詮釋上正典與否的權力差異，亦沒有明確的翻譯標準。然而相較於前述希臘案例的翻譯因在教學上過於工具化，使最終文本缺少可讀性，²⁶ 近代中國的古文今譯推行者不僅因重視白話寫作的訓練而對現代譯文的文字頗有要求，且確實有不少人提倡以今文徹底取代原文，使翻譯不失其方法上的嚴肅討論，對於作品的文字要求也並不低。所以無論是土耳其、希臘，或本文的近代中國，就行為定義的思考來說這些古文今譯案例都提醒了我們不該忽略非專業群體或社會普遍的認定看法，尤其需考慮個別的歷史、文化情境。畢竟無論實行者將自己的書寫活動認定為文本的整理改寫或本國語言內的翻譯行為，這些不同的動機本身即有助於我們思考語內翻譯或更廣的翻譯可以有什麼樣不同的可能性。

最後，以上討論也反映現有的語內翻譯論述往往需藉助實際的案例分析以進行描述性的定義輔助，如 Karen Korning Zethsen 本人針對丹麥語聖經翻譯的實例分析。²⁷ 尤其歷時性的語內翻譯涉及文化傳統，案例往往有其各自特殊性，值得個別探討以加以比較。因此，以下分析著重近代中國古文今譯不同層面的論述內容與文化現象。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古文今譯支持者如何藉由實際操作展現他們對於翻譯的印象理解，尤其語言改革的環境背景更加強他們反思古文與現代語文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翻譯案例中的原始文本語言與目標文本語言之間的關係——甚至進一步實驗現代語言本身的可能性；這些是在討論近代中國古文今譯案例時不可忽視的面向。

三、古文可不可以翻譯？

關於語內翻譯的問題在近代中國首先表現為古文是否可譯的論述爭議，正好可以回應前述土耳其案例中關於翻譯與整理、改寫的比較討論。相較於差不多同時代

²⁶ Christos Karvounis,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Greek," p.215-217.

²⁷ Karen Korning Zeths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 Attempt at Description," pp.795-812.

的土耳其作家對於翻譯的心存懷疑，近代中國的新知識份子很快就以「翻譯」指稱古典文本的白話改寫。他們一方面標舉自身文化內的翻譯與他國語文間的轉換在文化傳承上仍有根本性的不同，如下文郭沫若的論點，但同時又帶入一般語際翻譯所會遇到的各種問題，尤其首先即須思考該如何詮釋原始文本，以及語言上該如何拿捏以平衡翻譯的忠實度跟目標文本的可讀性。這種對語際翻譯的直接挪借，包括操作跟理論，在近代中國直接涉及的是古典文本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是由胡適在 1923 年所正式發起的科學化經典研究法「整理國故」；所以不意外地，上古經典，尤其是以《詩經》、《尚書》為主的五經翻譯在一開始即引起特別多的嘗試跟討論，在方法上所相對的則是「保存國粹」人士所堅持的傳統註釋訓解。

古文今譯支持者在基礎原則上以語際翻譯案例中語言、文化的距離跟挑戰回應批評者，甚至反過來將外文古典文本的白話翻譯也逕稱為「今譯」。如周作人以「古詩今譯」指稱自己翻譯的希臘古詩（1918），²⁸ 以及林語堂以中文俚語「今譯」美國獨立宣言（1934），²⁹ 亦有譯梵文佛經而稱「今譯」者（1922），³⁰ 顯見對他們來說語際翻譯跟語內翻譯在方法概念上的差距並不是很大，或至少有意識地淡化兩者間的差別。因此，如何以「翻譯」所具有的各種特徵回應傳統的經典解讀方式是近代中國古文今譯支持者最核心的命題，乃至於期許以翻譯之法全面取代古文的閱讀與傳承。

稍微值得注意的是，1920 年代以前的中國並不是沒有古文今譯的嘗試，但為時不長。如 1897-1899 年間，以教育推廣為志的蒙學公會發行《蒙學報》，即附有白話訓解，甚至圖示說明；1903-1905 年間，即科舉廢除的前夕，杭州文人施崇恩創彪蒙書室出版《速通虛字法》、《繪圖四書速成新體白話讀本》，以及《繪圖蒙學論說實在易》、《繪圖識字實在易》等系列教材，高達 75 種，部分書籍甚至刊行超過二十版。³¹ 施崇恩所出系列教材確實已頗接近民國以後的古文今譯，然有不少出版品（如《蒙學報》）其實較近於「淺說」，或當時所謂的「演義白話」，而非直接

²⁸ 周作人：〈古詩今譯〉，《新青年》第 4 卷第 2 期（1918 年 2 月），頁 124-127。

²⁹ 林語堂：〈我的話：今譯美國獨立宣言〉，《論語》第 54 期（1934 年 12 月），頁 270-272。

³⁰ 庶宗：〈聖梵「阿彌陀經」今譯〉，《哲報》第 1 卷第 9 期（1922 年 11 月），頁 31-32。

³¹ 資料數據參考石鵬：《百年中國教科書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0。

對應文本的「翻譯」。³² 且其「白話」並無標準，在當時即遭批評方言土語過俗，而官話對方言使用者來說又幫助有限。³³ 最後，施崇恩所編白話教材雖大受歡迎，頗具影響力，卻反樹大招風，引起清廷注意，被視為圖謀傳播維新思想而終遭查禁，彪蒙書室受此打擊更不得不遺憾停業。³⁴ 故古文今譯在晚清以失敗告終的初嘗試不僅顯示了白話文本純作啟蒙輔助的次要地位，且透露官方對於白話與維新進步彼此相輔相成的聯想，將古文轉譯為帶有民間色彩的白話文更是對傳統乃至於威權欲取而代之的挑戰行為。

進入民國，乃至五四時代以後，古文今譯所凸顯的文白之爭則開始了全新的敘事。1923 到 1924 年間，詩人郭沫若及史學家顧頡剛分別今譯了《詩經》及《尚書》的部分選文，明確以「翻譯」名之並直接討論其可行性，然分別採取文學性強的自由翻譯以及較嚴謹的學術考證手法，正式掀起古文今譯的熱潮，³⁵ 即本節探討焦點。

首先，郭沫若於 1923 年出版白話新詩集《卷耳集》，以《詩經·國風》部分詩作為本，距離其在現代詩壇開先之一的《女神》詩集（1921）僅兩年之久，透露他為現代中國文學劃設宏大架構的野心。在這個架構裡，經典是與五四白話文學同受革新的一部分，其值得保留的價值在於超越時間界線的傳統精神，需革除更新的則是語言表現。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郭沫若的「翻譯」其實更像是本於經典的自由創作。以下是其詩集第一首〈卷耳〉第一節的白話譯文，附上《詩經》完整原詩及目前廣為流通，較學術、教學導向的當代三民書局繁體本全詩譯文（滕志賢編譯），以便於對照：

³² 《蒙學報》淺說式演義白話相關討論，見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年），頁 121。

³³ 相關討論同前註，頁 123。

³⁴ 關於晚清政府對白話教材的禁止管制，見 Elis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rill, 2008), pp.308-315; 及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45-246。

³⁵ 較早的評論整理見智：〈古文今譯問題〉，《清華週刊：書報介紹副刊》第 9 期（1924 年 3 月），頁 19-20。該文提及「《卷耳集》出世以後，〔古文今譯〕纔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頁 19）。

《詩經》原文	郭沫若白話譯文	滕志賢白話譯文
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 我馬玄黃。 我姑酌彼兕觥， 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 我馬瘠矣。 我僕痛矣， 云何吁矣！	一片碧綠的平原，原中有卷耳蔓草開著白色的花。 有位青年婦人左邊肘上掛著一隻淺淺的提籃， 她時時弓下背去摘取卷耳，又時時昂起頭來凝視著遠方的山丘。 她的愛人不久才出了遠門，是騎著一匹黑馬，攜著一個童僕去的。 她在家中思念著他坐立不安，所以才提著籃兒走出郊外來摘取卷耳。 但是她在卷耳的青白色的葉上，看見她愛人的英姿； 她在卷耳的銀白色的花中，也看見她愛人在向她微笑。 遠方的山丘上也看見她的愛人在立馬躊躇，帶著個愁慘的面容，又好像在向她訴說別離羈旅的痛苦。	卷耳採了又採， 卻裝不滿淺淺的斜筐。 唉！我懷念的人兒 哟， 奔波在通往周國的大道上。 登上那座高山， 我的馬兒已經累垮。 我姑且從那金罍中搯酒， 藉此讓我不牽掛。 登上那高高的山梁， 我的馬兒毛色已經暗黃。 我姑且從那兕觥中搯酒， 藉此讓我不苦想。 登上那座石頭山呀， 我的馬兒病得不輕 呀， 我的車伕也生了病 呀，

	所以她終竟沒有心腸採取卷耳了，她終竟把她的提籃丟在路旁，儘在草茵之上思索。 ³⁶	多麼讓人發愁揪心呀！ ³⁷
--	---	--------------------------

表一、〈詩經·卷耳〉及郭沫若白話翻譯，對照滕志賢所譯三民書局版譯文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來郭沫若的白話翻譯創造性很強，有許多他的個人詮釋跟引伸，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文本改寫，甚至是受原作所啟發的全新創作。首先其文本篇幅大為擴展（注意以上郭譯文僅為第一節，約佔全詩三分之一，所對照的原詩及三民書局版譯文則為全文），詩中人物的視角也由第一人稱改為第三人稱，其他還有諸多細節，包括開首即自行加上「一片碧綠的平原」這樣的補充場景，以及人物動作、情緒變化等，刻畫出一名女子在廣闊平原上採摘卷耳時思念甫離家情人的愁慮，充滿郭沫若在《女神》詩集中的浪漫風格。相較之下，上引三民書局版滕譯本在字面意義上跟原作的關聯性更強許多，如此對比更可以發現同為古文今譯，郭沫若的譯文顯然不是基於訓詁的學術目的（雖然他偶爾仍會附註加上一些詞語解釋）；相反地，最終作品的文學性對他來說更為重要，如他自己在詩集序言中所直言的，其作乃本於「一人的直觀」，以便「在各詩中去追求他的生命」。³⁸

郭沫若的《卷耳集》開啟了近代中國古文今譯論述的第一波熱潮。論述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古文究竟能不能譯為白話？如果最終目的都是輔助讀解，相較於傳統的註解訓詁，或現代形式的「整理國故」，古文今譯真的會比較理想的方法嗎？

對古文今譯的反對者而言，古文——尤其是先秦五經——總是有些難以翻譯之處。這一方面多少源於當時部分國人經典神聖的信念，使文本幾乎被視為恆久不變的聖物，狀況類同西方基督教的《聖經》（而十七世紀歐洲《聖經》翻譯為現代語言的過程也頗堪比較）。³⁹ 但另一方面，古文經典的難以翻譯其實也是詮解本身的

³⁶ 郭沫若：《卷耳集》（上海：創造社，1923年），頁1-3。

³⁷ 滕志賢編譯：《新譯詩經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頁8-10。

³⁸ 郭沫若：《卷耳集》，序頁3。

³⁹ 《聖經》譯為現代歐語的相關討論，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pp.12-19; pp.37-46.

問題。即便是以文言為主要書面語言的歷代前朝，後世讀者也很難完全掌握經典原義甚至原貌，以致於一句、一詞往往存在不止一種的解釋；這使得將文本轉譯為前後一致且通順、獨立的內容在本質上即難以達成，所以並非純然的語言問題。這也意味著一個通順、獨立的白話譯文縱使對現代讀者而言更易於理解，這樣的文本卻也多少限縮了多元詮釋的可能，畢竟讀者所讀到的僅是譯者的個人解釋，或者照郭沫若的說法，譯者「一人的直觀」。⁴⁰ 這說明了為什麼古文今譯的反對者仍偏好註解訓詁或整理國故，因為其間所涉及的其實是閱讀習慣的問題；註解訓詁或整理國故確保了多元解釋，而多元解釋本身可以說早已是經典閱讀的一部分。

為了回應反對的聲音，郭沫若馬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古書今譯的問題〉（1924），專門探究古文的可譯或不可譯。首先，他並沒有直接回答該如何應對古文多義的問題，而是將重點放在原始文本的精神感情上。他的論點是無論古文的文字如何難解，其核心內涵始終不變：

四書五經我們讀牠們時深感困難，並不是牠們的內容艱深，實在是牠們的外觀古澀。如像國風中許多的抒情詩，我覺得十二三歲的人並不是不能領會，假如我們給牠們換上一件容易看懂的衣裳。此外如子書如佛經，只要我們把那針刺層剝掉了，無論甚麼人都是可以享用良鄉甘粟。⁴¹

如此看來，對郭沫若來說，若多義與艱深難解有一定的因果或果因關係，那文字的多元詮釋即為古書「外觀古澀」特徵的一部分，而這樣的文字特徵是可以分離剝除的。所以顯然郭縱使不相信文本僅有單一的文字解釋，但也不認為多重的詮解方式會造就不同的文義理解；當然他所謂的「文義」是建立在詩性的「領會」上，反映在他本身高度自由的翻譯文字裡。

關於文本內涵能否獨立於語言形式個別翻譯其實是個頗具爭議的問題，畢竟本質上涉及了文本內容能否置外於其語言形式而獨立存在。不少反對者認為古文今譯會「失掉古文的神氣」，⁴² 乃至於同屬五四人物的季羨林遲至 1990 年代回顧起延

⁴⁰ 郭沫若：《卷耳集》，序頁 3。

⁴¹ 郭沫若：〈古書今譯的問題〉，《創造週報》第 37 期（1924 年 1 月），頁 8。

⁴² 智：〈古文今譯問題〉，頁 20。

續至新中國的「古書今譯」亦提醒支持者需「有個限度」，⁴³ 認為不是所有的文本均為可譯，而他所強調的即是遣詞、造句這般修辭形式的難以翻譯：「對文學作品來說，不管內容含義多麼深刻，如果沒有文采，在藝術性上站不住，也是不能感動人的，也或許就根本傳不下來」。⁴⁴ 也就是說，一旦文本的形式經歷了改變，其實也就失去了它的美感精神。

這位曾在 1970 年代中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翻譯家季羨林並未解釋既然形式難以捨棄，那我們該如何看待語言勢必改變的語際翻譯作品；而 1920 年代的郭沫若正是把握住這個翻譯的特點論證古文今譯的可行。順應其著重「領會」的文本解讀精神，郭沫若進一步強調翻譯讀解的「情緒」聯繫，更以此對比古文今譯與語際翻譯的同與不同：

由一國的文字譯成他國的文字可能，由本國的古文譯成今言，當然更見容易。因為同是由原詩情緒的第二次表現，原詩如屬本國古文，於再感原作者的情緒上當然比較外國言文親切。⁴⁵

郭沫若曾在《卷耳集》序言中表明自己的古文今譯是受到印度詩人泰戈爾以英文翻譯其孟加拉詩作的啟發。⁴⁶ 這般以英文／孟加拉語類比古今漢語間的互通，似乎對他來說古文與現代漢語間的差距不比語際溝通來得更小，或者至少語言並非關鍵要素；他甚至舉出英國、日本現有的古文今譯例子證明此操作之可行（雖然多年後的季羨林表示英國今譯的例子不足為觀，因為「他們古書不太多」）。⁴⁷ 在郭沫若看來，翻譯是一種對於原作者情緒的「第二次表現」與「再感」，所有的文字語言俱是如「衣裳」般的外在之物；而古今中國人即使語言甚至文化上的距離宛若異國，但在「情緒」上總有更多彼此親近的可能。換言之，既然外文作品的語際翻譯因流通需要不得不容許部分失去的必要之惡，亟需現代化及教育普及化的近代中國為何

⁴³ 季羨林：〈漫談古書今譯〉，《群言》第二期（1992 年 2 月），頁 32-33。

⁴⁴ 同前註，頁 32。

⁴⁵ 郭沫若：〈古書今譯的問題〉，頁 9。

⁴⁶ 郭沫若：《卷耳集》，頁 4。

⁴⁷ 季羨林：〈漫談古書今譯〉，頁 32。

不能以翻譯之法「以濟諸法之窮」？⁴⁸ 更何況古今文化上有更多的內在聯繫？

下一節我們會看到，將翻譯融入古文讀解即便在近代中國郭沫若亦並非開先呼籲者，但他的作品是在古文今譯的五四早期討論度最高的。當然，這多少是因為其詩作風格浪漫自由，一改當時讀者對於《詩經》身為經書的文本印象。另外，即使對於不全然反對古文今譯的人來說，郭沫若的激進亦引擔憂。因為據其自身說法，他不僅不在意翻譯過程中原文意義的部分喪失，更欲以翻譯文本取代原作，使原作本身即消失在既有的文化脈絡裡，而這是他引以為法的語際翻譯所不會導致的結果，也多少是批評者如季羨林所強調的「該有個限度」。

同時期另一位古文今譯的實行者則較以經典訓解的角度出發，根據史學、治經的內在邏輯思考翻譯的可行性。《卷耳集》出版隔年的 1924 年，顧頡剛加入了古文今譯的行列，而身為史學家他顯然有更多事實考據上的考量；甚至可以說他的古文今譯正是為了復原他後來在重要論著《古史辨》裡所謂辨偽後的史實。

受到學界友人俞平伯蒐羅歷史教材的啟發，顧頡剛先後翻譯了《尚書》中的〈盤庚〉上篇、中篇跟〈金縢〉三篇文獻，且其中後兩篇更率先發表在新文學刊物《語絲》上，以顯示他所稱的「鬼治主義」上古政治，並宣示打倒「舊道德的權威」。

⁴⁹ 相較於郭沫若的自由改寫，顧頡剛的白話譯文確實更追求貼近原文，而這樣的原則也更加凸顯翻譯本身的矛盾。如下所示《尚書·盤庚》中篇的其中一段，對照顧頡剛標點原文及當代學者郭建勳三民書局版本的白話譯文，明顯相異處並以底線標示：

《尚書》原文	顧頡剛白話譯文	郭建勳白話譯文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u>乃咸大不宣</u>	現在我要把你們遷徙過去，希望安定我們的國家，但是你們不惟不能體會我心的苦	現在我將試圖率領你們遷徙，使我們的國家安定。你們不體恤我心中的苦

⁴⁸ 郭沫若：〈古書今譯的問題〉，頁 7。

⁴⁹ 顧頡剛：〈盤庚中篇的今譯〉，《語絲》第 11 期（1924 年 1 月），頁 1、3。另參考顧頡剛：〈盤庚上篇今譯〉，《古史辨》第二冊（北平：樸社，1930 年），頁 50-63。

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u>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u> 50	處，反要大大的糊塗起來，發生無謂的驚慌，想來變動我的主意：這真是你們自取困窮，自尋苦惱！譬如趁船，你們上去了只是不解纜，豈不是<u>坐待其朽敗</u>呢。<u>若是這般，不但你們自己要沉溺，連我們也都要隨著沉溺了。</u>你們沒有審查情形，一味憤怒，試問這能有什麼利益！……現我囑咐你們：<u>人家來搖惑你們的時候，你們應當把他們的話看作穢惡的東西一樣，不要去接觸牠。</u>我所以這般勸告你們，<u>正是要把你們的生命從上天迎接下來，使得你們可以繼續地生存。</u>⁵¹	衷，你們的心也都非常不<u>和順</u>，你們又很想以你們所謂的誠心來動搖我。你們這只是自找困窘、自尋苦惱，就像乘上渡船，你們卻又不渡河，這樣將<u>敗壞我們的大事。</u><u>你們的誠心與我不相合，就只有大家一起沉沒。</u>假如不去考察自身迷惑的原因，徒然自己怨怒又有什麼益處呢？……<u>現在我命令你們與我同心同德，不要揚起穢物來臭自己，這樣恐怕別人會使你們自己偏邪不正，使你們的心迂曲難通。</u>⁵²
--	--	--

表二、《尚書·盤庚》選文及顧頡剛白話翻譯，對照郭建勳所譯三民書局版譯文

若與郭建勳的當代譯文相對照，會發現兩者主要相異處更多是字義詮解跟斷句上的差異。如「爾忱不屬」句，顧頡剛自己提出「忱」作「沈」解、「屬」作「獨」解，故譯為「不但你們自己要沉溺，連我們也都要隨著沉溺了」；⁵³ 而郭建勳將「忱」

⁵⁰ 同前註，頁 2。

⁵¹ 同前註，頁 2-3。

⁵² 郭建勳注譯：《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頁 102。

⁵³ 顧頡剛：〈盤庚中篇的今譯〉，頁 3。

依字面解作「誠心」、「屬」則解為「合」，故譯為「你們的誠心與我不相合」。⁵⁴ 而「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句，郭其實斷為「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將「一」解作「同心同德」；顧頡剛句斷於「一」字之後，卻反而認為「照了原文次序譯不成句，故文氣略有變動」，也就是將後句的「迂乃心」提前，譯為「人家來搖惑你們的時候」，是這段文字翻譯上較大的變動，但其實主要也是因原文詮解的選擇所造成的差異。整體來說，顧頡剛自己翻譯的感想是除了「語氣」的改動，他「加入的字和加入的話太多了」，不過又自我解釋「不加這些，原文的意義又難以達出」，⁵⁵ 可以看出他在忠於原文字義上的努力，與郭沫若的《卷耳集》可說是完全不同的翻譯手段跟出發點。

另外關於文本多義，顧頡剛也跟郭沫若有不同的解釋策略。相較於郭沫若著重文本的情緒、精神以淡化文字歧異的問題，顧頡剛支持的是原始文獻本身即有多重來源的說法，或甚至視之為不同的「傳說」。⁵⁶ 如他舉出〈金縢〉中至少有三處因與他種文獻矛盾而使古來經學家曲解文義；他批評這些經學家因為「不知道傳說原是不同的」，「覺得聽牠參差是不大好的，所以要在參差之中修飾得一律」，故「把許多不同的記載整理成為一種相同的記載」，宛若畫蛇添足。⁵⁷ 換句話說，顧頡剛不僅認同文本的多重解釋，更進一步反過來強調尊重文獻字面意義的必要性，因為如此方能更真實地呈現史料多元的原始樣貌。所以關於曲解或解釋受限的問題，在顧頡剛看來今譯跟傳統註解的挑戰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白話翻譯需要更多語言上的改動增添；他甚至考量了解讀權力的問題，認為「至於意義多歧，索解不得，這只有各人隨著自己的見解多翻幾部出來，讓讀者自己選擇」，⁵⁸ 也就是將讀者解釋權轉化成了文本選擇權，而為了讓讀者有更多的文本選擇，學者更應「多翻」。

相較於郭沫若激起大量批評，顧頡剛折衷式的翻譯處理在學者間的接受度明顯較高。其鼓勵學者多翻的呼籲得到不少正面回應，這段時期出現多種同樣是《尚書》的古文今譯，包括顧頡剛譯過的三篇，也有其他選文，回應者甚至會主動提出翻譯

⁵⁴ 郭建勳注譯：《新譯尚書讀本》，頁 101。

⁵⁵ 顧頡剛：〈盤庚中篇的今譯〉，頁 3。

⁵⁶ 顧頡剛：〈金縢篇今譯〉，《語絲》第 40 期（1925 年 8 月），頁 2。

⁵⁷ 同前註。

⁵⁸ 顧頡剛：〈盤庚中篇的今譯〉，頁 4。

的學派根據，指出與顧譯本訓解上的不同，⁵⁹ 透露出以治經為本的學術興趣，而較少如郭沫若那般的文學關懷。

然而無論是追求自由創作的郭沫若新詩，或顧頡剛以訓解為本的學術譯文，這樣風格上的顯著差異及其所激起的各種討論反而讓我們看到 1920 年代中國對於翻譯的多元理解及想像。照如今當代學者的思維，郭沫若、顧頡剛的古文今譯確實都稱得上是「翻譯」。如前一節所討論的，即使是文字自由度高的郭沫若作品，其詩與《詩經》的文本「關聯性」仍然相當明顯，絕對是從原作「衍生」而來；至少他直接沿用了詩題，詩中情境亦仍能令讀者大致聯想。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文風自由如郭沫若的《卷耳集》，評者重點均在於古文的「能不能譯」，強調的是與傳統「整理」之法相較的優劣，兩者有明顯區別；「是否為翻譯」這般令當今不少語內翻譯論者困擾不已的問題反而並非重點。這多少源於中國本身根深柢固的經解傳統，使「翻譯」成為明顯的方法對照，同時也反映出近代中國無論譯者、讀者，對於「翻譯」的認定都較寬鬆，郭沫若與顧頡剛不同的翻譯策略更多被視為風格上的個人選擇，並不涉及翻譯精準與否的優劣評價。相較於晚清譯者如林紓，其作可說是基於白話口述的文言改寫，與原作差距不小而影響文壇至劇且廣受歡迎，連帶五四以後的讀者對於翻譯的嚴謹與否顯然亦保有不小的包容性；未若語內翻譯學者不無遺憾所指出的，世俗因存對翻譯的專業化印象而有更嚴厲的認定標準，如土耳其案例——畢竟晚清的翻譯名作不僅與我們當今習慣的「專業翻譯」本有不同，林紓譯作更並非純然的語際翻譯，實已牽涉古今文的語內翻譯，甚至如前所述，口說與書寫這樣廣義的符際翻譯。⁶⁰ 因此，如學者 Karen Korning Zethsen 所指出的，翻譯的文本「關係」可包含多種形式，「需視目標文本的形式目的而定」，⁶¹ 則近代中國的古文今譯以通達古文於今人為起始目標，藉翻譯求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操作與推行，而譯作成品的樣貌更容許多元可能，不以「對等」的追求為首要。當然，這也凸顯近代中國的古文今譯還另有進一步的運用，超

⁵⁹ 如曾廣烈：〈盤庚上篇今譯〉，《學術世界》第 1 卷第 5 期（1935 年 10 月），頁 57。

⁶⁰ 關於林紓透過口頭轉述譯為書面文言文的翻譯方式，見 Michael Gibbs Hill, *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特別是第二章。

⁶¹ Karen Korning Zethsen, "Beyond Translation Proper," p.299.

越原始文本的通讀傳播，而對於目標語言的書寫及定位思考著力更深，也就是接下來兩節的討論重點。

四、翻譯化的語文教育

彷彿是回應顧頡剛「多翻幾部出來」的呼籲，出版界跟教育界均開始積極投入這個古文今譯的文化事業。就出版來說，截至 1920 年底已有大量古文文本被翻譯為白話文，包括全本書籍、多冊套書跟單篇文章，如《四書》、《五經》，跟小說如《聊齋誌異》、《紅樓夢》等。白話翻譯亦成為官方、民間古文教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並融入各大考試測驗。由此可見古文今譯在近代中國的經典文化傳承上扮演了頗為關鍵的角色，甚至多少影響了近代中國對於古文文本的選文標準，也就是翻譯活動如何反過來決定原始文本的價值定位。

不少學者曾指出古典文本在近代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並非現代讀者的偏好結果，而是五四學者有意識的取捨編纂。⁶² 古典文篇的選擇，甚至經典化，涉及多重考量跟因素，但其中透過古文今譯的論述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五四以後文篇取捨的一大標準實為文本的構詞語法，而構詞語法的檢視即建立在古文今譯的操作上。這也透露古文今譯之蔚為熱潮，重點並不在於特定譯者針對特定文篇譯本的影響力，如前言提及土耳其二十世紀語內翻譯的案例即有許多出自名家之手並廣為流傳。⁶³ 相反地，在近代中國，郭沫若的《卷耳集》算是其中特例，古文今

⁶² 關於民國初年「國文科」的形成，見 Owen, Steven. "The End of the Past: Rewriting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Early Republic,"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s.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and Oldrich Kr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67-192; Robert Culp,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特別是第 III、IV 章; Robert Culp, "Teaching Baihua: Textbook Publish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a New Literary Can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4, no.1 (November 2008), pp.4-41; 陳爾杰：《「文章選本」與教科書——民初「國文」觀念的塑造》（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姜濤先生指導）。

⁶³ 關於土耳其的語內翻譯討論，見 Özlem Berk Albachte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s modernization of the language the Turkish case," *Perspectives*, 21, no.2, pp.257-271; Asli Kalem Bakkal, "Intralingual

譯的後續效果更主要是在於操作做法與過程，一種在教育界廣為運用的訓練方法；但相較於前所提及的希臘案例，近代中國盛行於古文教育的古文今譯又更講究現代譯文的文字精確及美感，非僅古文讀解的附屬產物。⁶⁴ 因此近代中國的古文今譯確有其案例特殊性。本節即將聚焦古文今譯如何被納入近代中國的古文教學，影響文篇的教材選擇，乃至於更廣泛的現代語文教育。

早在 1920 年，學者胡適就曾在〈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提出整理國故的做法建議，其中的古文教學法便涉及古文與現代國語的文法比較。具體來說，學生需先研習現代國語語法，熟悉後即可獨立閱讀甚至書寫文言篇章；而他直指整個過程最有「功效」的操作方式即為「多做翻譯，翻白話做古文，翻古文做白話文」。⁶⁵

這種古文、今文的可比性是奠定在胡適對於漢語語法演化上的信念。相較於晚清之際文言語法的開山作者馬建忠，胡適並不認為文言文歷朝歷代均保有基本不變的「一成之律」。⁶⁶ 他相信的是語言演化，認為文言文經難以數計的改變，最終成為現代白話形式，或者更標準化的國語。對胡適來說文法自然亦是如此：「國語是古文慢慢地演化出來的；國語的文法是古文的文法慢慢地改革修正出來的」，⁶⁷ 而其證據在於國語語法相較於文言語法更為簡單、整齊。⁶⁸ 他甚至反過來建議教學者利用翻譯、比較的方法讓學生「批評」古文文本，「由教員尋出古文中不合文法的例句，使學生指出錯在何處，何以錯了」。⁶⁹ 所以對胡適來說，今人難以理解的古文文法並不是任何文本個別風格甚至時代、地區在用法上差異，而是很單純的「錯

Translation Has No Name in Turkey”; A. Handan Konar, “Elucidating or (Un)breaking the Chai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s and Retranslations of Şeyh Galib’s Hüsn ü Aşk,” *Studies from a Retranslation Culture: The Turkish Context*, eds. Özlem Berk Albachten, Şehnaz Tahir Gürçağlar. Singapore: Springer, 2019.

⁶⁴ 關於現代希臘文在古文今譯中的次要性，甚至受忽略乃至於難以閱讀，見 Christos Karvounis,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Greek,” pp.211-212; pp.215-217.

⁶⁵ 胡適：〈中學國文的教授〉，《新青年》第 8 卷第 1 期（1920 年 9 月），頁 10。

⁶⁶ 胡適這裡針對馬建忠的批評引自胡適：〈國語文法的研究法〉，《新青年》第 9 卷第 3 期（1921 年 7 月），頁 4。

⁶⁷ 同前註。

⁶⁸ 關於胡適文言到白話文法上的進化論述，見胡適：〈國語的進化〉，《新青年》第 7 卷第 3 期（1920 年 2 月），頁 6-13。

⁶⁹ 胡適：〈中學國文的教授〉，頁 10。

誤」。現代國語文法沒有這樣的文法錯誤是歷代「改革修正」的結果，故應作古文文法的標準參照；不合標準者為「不通」，⁷⁰ 僅有教學上做為「例外」的價值。

需注意的是，將文法融入國語文教學始自晚清，但這般以白話為本的文白比較卻是 1920 年以後的風氣。⁷¹ 最具代表者為語言學家黎錦熙的文言文法著作。若說胡適所提倡的文白比較之法為一時權宜，畢竟他自己當時確正著手《國語文法概論》（1921 年），然就文言文來說「現在還沒有好文法書」，⁷² 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不僅有「錯誤矛盾」，尚且「太繁」，「不合中學堂教本之用」；⁷³ 黎錦熙則更是將此比較概念付諸實行，在 1924 年針對現代白話的《新著國語文法》之後又於 1933 年發表針對文言文的文法著作，並直接名為《比較文法》。以教學為發行目的，此語法著作明白指出其以比較、翻譯之法為本：

以應用言之：吾人苟欲暢讀古籍，欣賞舊文，其道無他，惟在先明現代漢語文法以植其基，以立其綱，而總攝一切古文文法，比較之，翻譯之而已。⁷⁴

和馬建忠一樣，黎錦熙大為借重西方語法，他所謂的「通中外之郵」。⁷⁵ 然而他還另外講求「會古今之要」，或「達古今之變」，⁷⁶ 而「會」與「達」的關鍵便在於語法上的通解：

文法原是一種隨時代而轉移標準的東西，只要約定俗成，在社會上通行無阻，文法上就要予以承認的：儘管邏輯上不合式，也要認它是文法上的一種慣例；在源頭上確是不通，在應用上也要認為通；反之，於古有徵，然而過時了，落伍了，也要認為不通：這樣才算是時代明確的「標準文法」。……

⁷⁰ 同前註，頁 11。

⁷¹ 除馬建忠於 1898 年出版的塾基之作《馬氏文通》，晚清由西方、日本其實引入了多種文法書，並融入改革中的學堂教育，只是當時所謂的「文法」有時廣及文章作法與修辭，甚至單純讀本亦稱文法。見陸胤：〈作為文學門徑的「文法」——語法學、修辭學與近代文章學的刷新〉，收入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頁 221-286。

⁷² 胡適：〈中學國文的教授〉，頁 9。

⁷³ 同前註。

⁷⁴ 黎錦熙：〈緒論〉，收入黎錦熙：《比較文法》（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9。

⁷⁵ 黎錦熙：〈原序〉，同前註，頁 11。

⁷⁶ 同前註，及〈校定重版後記（1957）〉，收入黎錦熙：《比較文法》，頁 194。

這種通不通的「標準」究竟是誰規定的？乃是時代規定的，是現在還在使用文言文的社會規定的。⁷⁷

同胡適，黎錦熙相信語法的時代演變，且不僅以現代語言為優越形式，更以現代使用者是否通解做為文言語法的「標準」。他並將符合現代標準的古文稱為「普通古文」，認為這樣的文本雖然失去語言溝通的作用，但仍有書面保存的價值。相對的則是充滿「不通」語法的「特別古文」，認為這樣的文本簡直是「嘴裡紙上都死了的」，⁷⁸ 即便令學生閱讀，也僅能做為非典型的例外形式，並不具有教學價值。

有趣的是，黎錦熙以「比較」名之的文法著作未被全然接受，理由正是出於該如何看待文言、白話的關係。如語言學家劉半農即根據十九世紀初 Franz Bopp 的印歐語系研究，強調「比較文法」這個語言學上的專有概念僅適用於「同族(Family)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而文言、白話或方言、標準語間的異同則「只是語言的地理的或歷史的研究」。⁷⁹ 換言之，對劉半農而言，古今語縱有差距，在學理上原屬一種語言，並無可比之處，可以想見對他來說古今語之間亦沒有「翻譯」的關係跟必要。對於劉半農的意見，黎錦熙當即回覆，但也僅聲明其作並非嚴格定義上的「比較文法」(comparative grammar)，而更該說是「中國語法的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並不否認自己方法上的缺失（照他的說法是「邏輯上並不錯」）。⁸⁰ 事實上，黎錦熙的「方法」並不著重深奧的理論探究，而是建立在教學實踐的藍圖之上，也就是令學生以國語文法的基本訓練通解普通文言文，「只消給他一個比較，給他一個有系統而最扼要的比較：這就是本書的主要任務」；⁸¹ 而關於其書之本的比較、翻譯之法更直言以「應用」為出發點，是為「語文教育」之必然偏重。⁸²

以大環境而言，黎錦熙之強調古文教學的比較、翻譯並非獨樹一幟，在當時其

⁷⁷ 黎錦熙：〈原序〉，頁 15。

⁷⁸ 同前註。

⁷⁹ 劉復（劉半農）、黎錦熙：〈論比較文法名稱書〉，《國語週刊》第 4 卷第 87 期（1933 年 5 月），頁 1。

⁸⁰ 同前註。

⁸¹ 黎錦熙：〈原序〉，頁 14。

⁸² 黎錦熙：〈緒論〉，頁 19。

實相當普遍，且有其情境背景。近代中國自民國以來推行國語文教育，不僅教材漸趨白話，國語更在 1920 年成為官方教材的正式語言。但從小學階段的「國語」過渡到中學以上的高階「國文」卻因此出現嚴重斷層。畢竟文言文基本上已退出小學國語教材，卻仍是中學國文的課程主幹，實際教學現場教材更缺標準，不少教員習慣自編講義，文言選文往往偏難，所以即便到 1940 年代仍有論者批評中學國文教材難度堪比大學中文系內容，⁸³ 作文更仍多以文言為尚。⁸⁴ 這般語文教育上的斷層一方面凸顯當時國人依舊重文言、輕白話的文化價值觀，僅將白話視為低階啟蒙而非教育主體；另一方面，就結果而論則反映在輿論間對於當時學子國語文程度每況愈下的集體焦慮——也就是文不文、白不白，既缺少傳統古文的基礎訓練，又無法以白話國語進行更高階的溝通表達，特別是書面寫作。⁸⁵

在這種青黃不接的情況下，不難想像古文今譯既重視古文讀解又講求白話書寫的特徵如何被寄予語文改革上的期望。事實上，國民政府很快就正式回應了這個教學辦法。1929 年，甫由大學院改組更名的教育部頒佈〈初級中學國文暫行課程標準〉，即建議文法教學「應注重語體文法與文言文法的比較」，⁸⁶ 完全採行了胡適於 1920 年所提出的中學國文教學建議（首任教育部長為同為北京大學出身的蔣夢麟；至於胡適本人是否參與課程標準訂定有待查證）。更甚者，同樣是 1929 年的部頒課程標準即在「作文練習」的教學要點項下指示「為引起學生作文興趣」，教師可令學生練習翻譯，「翻文言文為語體文，或翻古詩歌為語體散文或語體詩歌」；⁸⁷ 同樣是胡適的建議，但顯然政府不僅將古文今譯視為文言文的教學方法，更進一步將之

⁸³ 相關討論頗多，姑舉數例，見余冠英：〈從大一國文教材想到中學國文教材〉，《重慶清華》第 18 期（1948 年 6 月），頁 1；孫毓蘋：〈論中學國文教學〉，《國文月刊》第 64 期（1948 年 2 月），頁 5-6。

⁸⁴ 見羅莘田：〈我的中學國文教學經驗〉，《國文月刊》第 20 期（1943 年 3 月），頁 25。

⁸⁵ 1930、40 年代頗多關於學生國語文程度低下及該如何改進的討論，參見尤墨君：〈中學國文前途的悲觀〉，《中學生》第 20 期（1931 年 12 月），頁 1-9；若士：〈從一本國文試卷談到中學國文教學的問題〉，《盍旦：文藝、哲學、歷史、雜文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5 年 10 月），頁 6-10；姜慕先：〈中學國文教材與教法後序〉，《協大藝文》第 14/15 期（1942 年 6 月），頁 74-76；李廣田：〈中學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補救辦法〉，《國文月刊》第 28/29/30 期（1944 年 11 月），頁 4-8。

⁸⁶ 〈專載：初級中學國文暫行課程標準〉，《湖南教育》第 13 期（1929 年 11 月），頁 6。

⁸⁷ 同前註。

應用在白話的寫作輸出。之後 1932 年教育部另外公布的正式〈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及〈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均保留前兩項關於古文今譯的教學建議，且額外補充初級中學在教材選用上需「句讀簡明，音節諧適，而無文法上及倫理上之錯誤者」，⁸⁸ 而高級中學則是在「文章作法」的習作部分強調「文法應繼續注重語體文與文言文之異同。古書上文法特例，亦應分別說明，以為學生讀解古書之助」，以符合文法者為本，不符文法者為例外的進階學習，完全是胡適的選文標準及之後黎錦熙《比較文法》的分辨原則。而最終這般文言、白話相輔相成的教學理想目標則是在學子畢業時「能以語體文作充暢的文字，無文法上的錯誤」，且另一方面「能閱覽平易的文言文書籍」，⁸⁹ 以比較為本的古文讀解搭配今譯書寫正符合這樣的教育藍圖。

經學者、官方的兩相呼籲，古文今譯確實成為近代中國國語文教育的既定訓練。尤需注意的是，雖然今日不少華語地區的體制教育仍多少採用古文今譯，常用讀本亦包含白話譯文（如前引之三民書局版本），但在標準國語仍逐步成熟的 1930、40 年代，古文今譯推行者對於白話部分的重視卻有其獨特背景。前述官方課程標準明白指示以翻譯訓練學生語體作文是很明顯的立場態度，後續第一線教師們對於官方指引的各種回應與演練分享也凸顯翻譯一石二鳥的操作優勢，甚至認為比命題作文「靠得住得多」，因為命題作文涉及更多觀點面向，反不如翻譯「逐字逐句都要仔細琢磨，不能絲毫放鬆」，⁹⁰ 對於語文訓練似乎更有針對性，也更符合當時追求精確、標準的教育理念。早在 1924 年即出版，後續且再版多次的一部古文今譯合集《古文今譯中國故事》（王治心編譯），序言亦強調該書刻意「把今譯的白話文寫在前面，再把原有的文言照錄在後面」，多少有抬升白話文地位的味道，且「單會文言不會作白話的人可以效法他的白話」。⁹¹ 另外有趣的是對照脫離日治時代的台

⁸⁸ 〈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 5 卷第 46 期（1932 年 11 月），頁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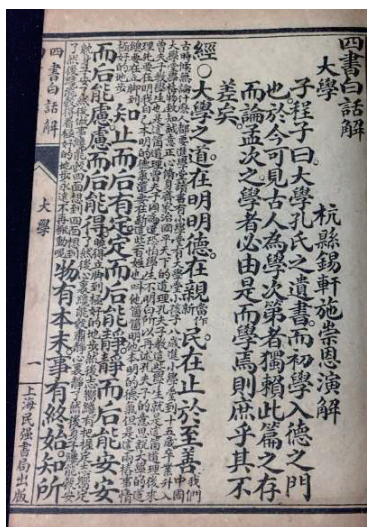
⁸⁹ 〈專載：初級中學國文暫行課程標準〉，頁 7。

⁹⁰ 曉初：〈中學國文教學叢談〉，《教育建設（南京）》第 3 卷第 2 期（1941 年 11 月），頁 12-13。

⁹¹ 《古文今譯中國故事》為一本以基督教宣教為目的的古文選，該序由號稱儒者基督徒的范子美所寫。范子美（韶誨）：〈序王治心先生古文今譯中國故事〉，王治心：《古文今譯中國故事》（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1 年），頁 3。

灣，在國語文教育已小有所成的 1970 年代，推行國語教育頗具影響力的《國語日報》出版《大學文選：古今文選》，還特別解釋書中的白話翻譯「無意用以代替原文」，⁹² 呼應五四時代部分推行者欲以今譯取而代之以的激進作風；顯示古文今譯中的「今譯」在國語文推行的環境之下被不少人推至極高的地位，乃至於幾乎超越文言原文本身，雖然這確實是不少五四時代古文今譯推行者的初衷，如前一節所示。

此外，在讀本設計上亦可看出 1920 年後古文今譯中白話部分的越加專業化、標準化。如下所示晚清影響力最大的施崇恩彪蒙書室所出的《四書白話解》（下圖一），對照 1924 年錦章書局《四書白話註解》（下圖二），後者即使是延伸性較強的白話段落（如《大學》首句文解），相比於已較接近民國今譯標準的彪蒙書室讀本仍更加貼近嚴謹意義上的「翻譯」。



圖一、施崇恩編：《四書白話解》（上海：彪蒙書室，出版年份不詳），頁 1。



圖二、《新式標點四書白話註解》（上海：錦章圖書局，1924 年），頁 1。

⁹² 〈介紹「大學文選」〉，收入國語日報社編：《大學文選》（臺北：國語日報社，1973 年），書序。

二者白話文本的功能與意義也稍有不同。如同樣以「解」指稱白話輔助文字，彪蒙書室強調「所演純用官話」，⁹³ 編者亦標為「施崇恩演解」，而非「編譯」或「編輯」，回應當時白話演義的閱讀文化；錦章書局則以「註他的字義」的「註」，⁹⁴ 相對於「解他的句意」的解文，而所謂的「解」確實是以翻譯為本。這般註與解的兩相對照更凸顯五四以後今譯譯者如何在傳統註解的基礎上延伸應用，即前一節所論今譯與經解傳統間孰優孰劣的取捨安排。甚至版面設計亦基本沿用傳統印刷習慣，而非新式排版，年號亦不用數字，而採干支（「民國甲子年」），看得出編譯者取新之餘以舊學為本的心態。

當然，這樣的取捨還另有環境、市場的考量。如晚清彪蒙書室同樣凸顯其書「但求明白不嫌淺略」以「使教者受者瞭然心目不索而解」的編輯原則，⁹⁵ 1924 年錦章書局版除追求學子「開卷了然，不僅便利教授，實在足以引起童蒙的精神呢！」更越發坦承其書之所以「但求意思明白，不嫌詞句淺近」，首要出發點即為「順了新文化的潮流」，⁹⁶ 顯示其迎合大環境需求的出版立場。尤其錦章書局版語言上雖然淺近但基本為通順國語，並無晚清其他讀本過言或過俗的問題；⁹⁷ 且相較於彪蒙書室版，更標榜新式標點的使用以輔助語氣，最明顯者為驚嘆號的大量使用（連例言說明亦多處可見，如前句引文「實在足以引起童蒙的精神呢！」，而彪蒙書室發凡則純為文言）。所以整體來說，即使是 1920 年代今譯早期讀本的白話，相較於晚清不僅口語化且「國語」化，而細節安排如註、解的彼此輔助及版面設計，則仍可見編者保留傳統習慣的刻意安排。當然更關鍵的是，相較於晚清白話讀本以遭禁做終，民國以後的古文今譯卻廣泛運用，乃至於今，成為近代中國古文教育的必要訓練。

⁹³ 施崇恩編：《四書白話解》（上海：彪蒙書室，出版年份不詳），發凡。

⁹⁴ 《新式標點四書白話註解》（上海：錦章圖書局，1924 年），例言。

⁹⁵ 施崇恩編：《四書白話解》，發凡。

⁹⁶ 《新式標點四書白話註解》，例言。

⁹⁷ 晚清部分讀本偶有以方言釋義者，如美國傳教士范約翰（John M. W. Farnham）所編《花夜記》第三冊以後的版本便以蘇州話做釋文，而時人陳榮袞便批評一方面官話「不便土人」，然另一方面以方言俗話作解又會有「不能行之他方的困難」，最終反較既非官話、亦非方言土白的「淺說」文字更加難以普及。轉引並參見陸胤：《國文的創生》，頁 118、123。

之後的古文今譯讀本當然在國語行文上越加標準，排版更現代化，翻譯本身基於教育、學術的目的也趨於追求字面意義的掌握，整體演變為我們今日所熟悉的古文選本白話譯文。經 1920、30 年代的大力推廣，翻譯更是成為古文教育的慣例操作，及於今日；只是語言改革背景下的古文今譯在古文讀解之餘更強調今譯的白話書寫，融於語體作文的訓練模式。而下一節，我們會看到今譯的白話書寫在 1930 年代有了更進一步的延伸發揮。

五、古文的地方聲音

若說 1920 年代末的近代中國呼應了官方指引，不僅以翻譯做為古文讀解的教學方法，且將之運用在白話語體文的寫作訓練上，那 1930 年代初的一場討論更是進一步拓展了「今譯」的意義範圍。1932 年，由魏建功所發起（以其筆名文狸），集合其他幾位同為北京大學背景的學者，包括錢玄同、何容等新文學推動者及語言學研究者，透過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刊物《國語週刊》發動了古文今譯的地方徵集。其起因是當年北京大學的入學考試要求受試者以白話散文翻譯一首唐代詩人杜甫的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可說是古文今譯運用於正式考試的典型範例。⁹⁸ 只是《國語週刊》諸公並不滿足於單純的國語翻譯，而更上一層鼓勵多文類及多方言的蒐羅創作，具體實現前述胡適、黎錦熙、郭沫若等人以活白話復原死古文的精神信念。他們不僅鼓勵以注音等標音符號將書面文字重新聲音化，亦倡導以翻譯為本的多方言白話新作，儼然是既擁抱風俗化的新國學，又著眼呼應傳統精神的新文學。

魏建功等人以古文今譯為出發點的地方化關懷很明顯是回應了五四以來的歌謠運動。同樣源於北京大學，近代中國的歌謠運動一般認為始自 1918 年由《北京

⁹⁸ 當時大學入學考多有採用古文今譯為考題者，如同年北京大學理學院入學考亦考古文今譯，試題出自《墨子·非攻》，見魏建功（文狸）：〈談文翻白〉，《國語週刊》第 2 卷第 46 期（1932 年 8 月），頁 2；隔年北京大學文法科入學考試亦考古文今譯，考題出自徐霞客《江右遊日記》，見魏建功（文狸）：〈談何容易文翻白〉，《國語週刊》第 4 卷第 101 期（1933 年 9 月），頁 1；北平師範大學入學考古文今譯則取自《世說新語》，見錢玄同：〈古書今譯〉，《國語週刊》第 4 卷第 100 期（1933 年 8 月），頁 1。

大學日刊》所發起的全國性歌謠徵集，劉半農擬定的徵集簡章更被視為中國民俗學運動的號召起始；後續則有 1920 年成立「北大歌謠研究會」，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1922 年創《歌謠》週刊，1925 年併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組「風謠調查會」，1936 年由胡適重新主持復刊《歌謠》直至 1937 年。由此可見，魏建功等人在 1932 年於《國語週刊》上所發起的古文今譯徵集正處於歌謠運動由北大國學門主其事的階段，在風格走向上一方面關注歌謠民俗性，另一方面則著重「新國學」的學術論說，⁹⁹ 而古文今譯既國學又標榜民間白話的跨界特性正呼應了這樣的文化訴求，且文本對象是更直接的古文經典本身。究竟《國語週刊》上的古文今譯討論反映出什麼樣的國／俗、文／白對話呢？這樣的國／俗、文／白對話就古文今譯在這段時間的發展有何意義？就大環境的國語改革來說這樣的文化事件又凸顯了什麼？最後呼應翻譯的概念討論，這樣的方言書寫又如何透過口語的書面化讓我們進一步思考歷時性翻譯所會遇到的語言複雜性？甚至是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及的，挑戰語內翻譯與符際翻譯的界線？

我們先來看看魏建功本人的譯文作品與前兩節郭沫若及顧頡剛的今譯有何異同（附原文對照；標點符號依照原文）：

杜甫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原詩	魏建功譯文
1. 八月秋高風怒號， 卷我屋上三重茅。	八月 <u>深秋</u> 時節，風 <u>兇吼吼</u> 的刮去我屋上的 <u>三層</u> 草。
2. 茅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掛罌長林梢， 下者飄轉沉塘坳。	草飛過了江散落在沿江的野地：高處的掛在 <u>一帶樹林</u> 的梢頭就像晾著 <u>網子</u> 一樣，下面的隨風打旋沉下 <u>圩塘港坳</u> 裡去。
3.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 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	南莊的些孩子們欺負我老了沒有能耐，竟肯忍心當面動起搶來，大模大樣的撿了草走進竹林裡去，叫喊得我唇都枯了嘴都乾了也不中用。

⁹⁹ 徐新建：《民歌與國學——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頁 21。

唇焦口燥呼不得。	
4. 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我獨自走回拄著拐杖嘆嘆息，不大忽兒風停了，雲彩泛成墨一樣的顏色，秋季傍晚的天氣漸漸迷迷濛濛的黑了。
5. 布衾多年冷似鐵， 驕兒惡臥踏裏裂。	到夜來老布被窩年久涼的像鐵一樣，頑皮的孩兒睡得武蠻把裡子給踹裂了。
6. 牀牀屋漏無乾處， 雨腳如麻未斷絕。	一牀一牀的屋漏得那兒都沒有乾地方，風掃進細星星的雨腳亂麻似的沒有個完。
7. 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沾濕何由徹！	自從遭難就很少安易的睡覺，這樣浸淋得稀潮稀溼的一長宵又怎麼著過！
8.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怎樣得到成千帶萬的高房大屋，普遍的庇護著天下貧窮人士一個個都歡天喜地的，風呀雨呀全不能動撼，平平穩穩的像山一樣。
9.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呀，什麼時候眼面前看到這高高的房子？單是我的房子破了挨著凍，就是死了也甘心願意！ 100

表三、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及魏建功白話譯文對照

整體來說，魏建功的翻譯算追求字面上的嚴謹，至少並未如郭沫若那般自由延伸。細看其文字則可以發現不少並非一般國語的慣用語彙，即魏建功建議並進一步徵求以方言翻譯者（上表以底線標示者），¹⁰¹ 理由是若求直譯，「這些詞是未必全具於國語」。¹⁰² 所以他隱然認為方言較國語有更多詞彙上的可能性跟豐富程度，而國語

¹⁰⁰ 魏建功（文狸）：〈談文翻白〉，頁 2。

¹⁰¹ 魏建功更特指部分為「詞頭」，包括原詩中秋高的「高」、灑江郊的「灑」、「掛胃」、「塘坳」、向昏黑的「向」、「嬌兒」、「惡臥」、「裏裂」、「喪亂」、何由徹的「徹」、「突兀」，共十一詞（魏建功（文狸）：〈談文翻白〉，頁 1）。「詞頭」在語言學中一般指附加於詞根前的成分，但魏所舉出之詞彙並不符合這個定義，且本人並未詳加說明，僅指為文法成分，故難以確知其意所指。姑僅指出供參。

¹⁰² 同前註，頁 1。

則是有限的、不足的。另外他還指出以方言翻譯的精確性。比如第六聯中的「惡臥」意指「睡相不佳」，魏建功譯為「睡得武蠻」，說是來自地方說法的「蠻睡」、「武睡」，即「睡相不好」；若沿用原文中的「惡」字而逕譯為國語，則這個詞有可能被誤認為動詞，而將該句解為「不願意睡」、「怕睡」、「懶得睡」等，而非他所認為形容動作的副詞。¹⁰³ 所以對魏建功來說，方言用語不僅使文句更加活潑生動，還有助於釐清文意，可見國語的有限、不足已難以妥切表達古文原意；其背後隱含的是與胡適、黎錦熙等學者一致的語言演進信念，並實際以方言作為使國語更完整、更進步的輔助策略，乃至於可以廣納古語。

方言較國語更近於古的看法是這段時期語言改革的基礎精神之一，具體則展現在地地方采風，包括前述的歌謠採集及此處的古文今譯。魏建功在分享自己的譯文之餘明白呼籲方言的古語徵集，甚至古文文本的地方版本。他自己亦分享了《論語·先進》中「風乎舞雩」一段流行於河南東部的版本，錄於下（附《論語》原文；「註」為原有，翻譯及《論語》文本分行、標點俱依魏建功原文）：

《論語》原文	河南東部版本
「點爾何如？」 鼓瑟希，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夫子說：「你說啥？」（註一） 曾皙在那彈琵琶。 彈得琵琶ㄅㄛ ㄅㄛ響：（註二） 「夫子在上聽我講，我跟他們不一樣。」（註三） 夫子說：「那怕啥！各人說能各人的話」（註四） 曾皙說：—— 「當今日，三月天，新做起的大布衫；大的大，小的小，

¹⁰³ 同前註。

風乎舞雩； 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	同上南坑去洗澡； 洗罷澡，乘風涼； 回家唱個山坡羊。」 夫子聞聽心歡喜： 「我的徒弟就屬你！」 (註一) 啥，什麼。 (註二) ㄅㄛ ㄅㄛ 弦樂器撥弦的發音形容語。 (註三) 跟音 geir，和。 (註四) 能音 neong，你們。
--------------------------------------	--

表四、《論語·先進》「風乎舞雩」文本與魏建功所錄之河南東部方言譯文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論語》的散文形式在地方版本中被韻文化，部分用注音、羅馬拼音呈現或註明以保留口語的聲音情態（如「ㄅㄛ ㄅㄛ響」），並有不少改動及增字。魏建功認為這樣的文字表現「雖不句斟字酌的針鋒相對，可是最要緊的神情全表現得活鮮活跳的了」；¹⁰⁴ 可見相較於郭沫若講求文本「精神」的創造式翻譯，魏雖亦重原文之「意和神」，¹⁰⁵ 但多少懷有「句斟字酌」、「針鋒相對」的原則追求。

有趣的是，《國語週刊》編輯及供稿者亦多少有意識地透露其地方版本的「採集」軌跡，以顯其民間口傳本色。如魏建功分享前引河南〈先進〉篇方言版本，強調來源是「我的妻曾背給我聽」；¹⁰⁶ 後續來稿者亦多類似補充，如聞自某友、家兄等，或另向本地人打聽、考證，有不確者更直接在週刊上尋求更正補足，以使其作「庶得成為善本與全璧」。¹⁰⁷ 其中魏建功錄其河南版本時曾附註「據說還有山東方言的譯作」，¹⁰⁸ 更另外引起編輯錢玄同接續回應魏所聞之山東版本即出自他口，除

¹⁰⁴ 同前註，頁 2。

¹⁰⁵ 同前註。

¹⁰⁶ 同前註。

¹⁰⁷ 錢玄同：〈述幾段古書的今譯〉，《國語週刊》第 3 卷第 54 期（1932 年 10 月），頁 1。

¹⁰⁸ 魏建功（文狸）：〈談文翻白〉，頁 2。

照錄全文，又補充此版本偶然得於其友高某，錢隨手記下然已不存，僅憑記憶錄下，但細數紀錄年份的季節、地點、事因，甚至記得自己當日身著薄袍（當然也是映襯「春服既成」、「風乎舞雩」的背景氣氛），¹⁰⁹ 儼然凸顯來源之真確無欺。而文本的整個紀錄過程則充分顯示地方采風口耳相傳的流動特質，一方面透露文字的不確定性，但也多少另增風俗趣味。

當然，《國語週刊》諸公並未天真以為這些地方版本是較書面古文更早的口白形式，仍稱此類文本為「譯文」，更關心的仍是古文可能的民間化再創造。因此在魏建功發起今譯三個月後，週刊編輯黎錦熙與錢玄同因來稿熱烈受寵若驚，不得不宣告徵集的官方標準以「把徵求的範圍劃定一下」，並總結以三字：「信達俗」，¹¹⁰ 顯然是回應晚清著名譯者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這般以「俗」代「雅」，讓魏建功及其學界同好將古文今譯推廣為方言文學化的輔助操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方言入文的行文模式不僅是書寫方面的創新，亦涉及閱讀習慣以口為本的媒介思考，使這樣的古文今譯帶有以書面轉譯口語的符際轉換特色。相較於追求統一的國音，甚至「我手寫我口」的白話理想，魏建功認為文本的聲音並不一定要與書面一致，因為他所以為的優秀作品應該在重疊的聲音裡展現活力，也就是他在 1934 年另一篇文章〈中國純文學的型態與中國語言文學〉裡所謂流傳於口的「口治文學」，而非僅能目讀的「目治文學」。¹¹¹ 他相信文字應該僅有指涉意義、概念的「符號」功能，或為代表聲音的「器」。也就是一個字符習慣上即使具有一種或數種特定的發音，但在朗讀出聲時卻並不一定要按照字面上的語音，所謂的「音讀」；相反地，只要意義詮釋得當，念讀上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發揮，所謂的「訓讀」（魏建功自承受到日人念讀漢字方法的啟發）。¹¹² 正如同前述「惡臥」的例子，文字的字面發音甚至反而難以凸顯文本的內涵意義，至少使讀者的詮釋受到了一定的侷限。因此，為求更貼近文學的「自然」、「活力」，¹¹³ 魏建功

¹⁰⁹ 錢玄同：〈述幾段古書的今譯〉，頁 1。

¹¹⁰ 〈編者附言〉，附於以下文後：陶端格：〈兩段古書今譯〉，《國語週刊》第 3 卷第 59 期（1932 年 11 月），頁 2。

¹¹¹ 魏建功：〈中國純文學的形態與中國語言文學〉，《文學（上海 1933）》第 2 卷第 6 期（1934 年 6 月），頁 984-985。

¹¹² 同前註，頁 984。

¹¹³ 同前註，頁 985。

建議讀者不必拘泥於「一字一義，一義一音」的閱讀習慣，¹¹⁴ 而是在詮釋基礎上開發更多的聲音可能，並總結方言的利用便是最值得參考的做法。

整體來說，身為國語運動的推行者，魏建功等人融方言於今譯的實驗自有其宏大目標。對他們來說，理想的國語文學正該「將這種活鮮活跳的語言的精彩抓住」，¹¹⁵ 以達到「方言國語化，國語化方言」，乃至於終極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¹¹⁶ 而古文今譯的操作正提供了國語、方言及古文一個完美的共享平台，各自貢獻了屬於標準化、口語，及經典傳統的優點。如當時參與討論的何容在十數年後回顧他們的實驗：「作小說戲劇，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而作翻譯總比創作容易些，因為觀察和想像佈局等工作都由原著者作了，自己不過把那本書的文字換個過兒就是了」。¹¹⁷ 這也就是前一節所述官方指引的古文今譯作文法，只是如今更進一步擴大到方言口語的文本書寫，著眼於方言與國語透過古文的共通源頭以互相融合包容的可能性。

六、結語

以翻譯學內的「語內翻譯」論述為關切核心，本文聚焦 1920、30 年代中國的「古文今譯」現象，分別由三種案例探討時人如何透過翻譯改造古文經典，並進一步將之融入語文教育，甚至運用在現代白話的寫作訓練與方言的采風、改寫。首先在 1923 及 1924 年，作家郭沫若與史學家顧頡剛分別今譯了《詩經》、《尚書》中的部分篇章，但卻採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前者自由而個人，後者則講求學術考證——不僅顯示當時個別對於古經典現代化的信念差異，亦反映翻譯運用的多元靈活性。本文其次以 1920 年代初胡適、黎錦熙所提出的比較文法為出發，佐以 20 年代末以後的官方政策與讀本出版物，論證古文今譯如何一方面成為古文教育的基本方法及選文標準，另一方面更反過來廣用於現代白話的寫作訓練及考核。最後一節根

¹¹⁴ 同前註，頁 984。

¹¹⁵ 魏建功（文狸）：〈談文翻白〉，頁 2。

¹¹⁶ 魏建功（文狸）：〈談何容易文翻白〉，頁 1。

¹¹⁷ 何容：〈論翻譯古書〉，《何容文集》（臺北：國語日報社，1975 年），頁 238-239。

據 1932 年魏建功、錢玄同、何容等學者於《國語週刊》上的討論，探究古文今譯如何融入當時方言采風的文化現象，被賦予方言國語化、經典化的實驗意義，而國語、經典則進一步有了地方性的民間特色。由古文的現代化、文白的讀寫教育，乃至於方言文學的採集口傳，我們看到古文今譯以其會通古今的精神意義與跨越語言的實務價值，在現代中國的語言文化改革進程上扮演了關鍵的推動角色。

回應翻譯學者 Karen Korning Zethsen 晚近所提出的翻譯定義，現代中國古文今譯的案例有幾個就語內翻譯而言較顯突出的特點。如前述，語內翻譯的一大爭議在於它究竟算不算翻譯，問題核心則是古今語的距離認定。但無論視古今語為同樣語言或不同語言，語內翻譯的討論又往往陷入更深的矛盾：若為同樣語言，則這樣的文本轉換是否為「翻譯」便可能招致疑慮，對部分學者及操作者來說或許更接近於文本「改寫」；然而若為不同語言，其與語際翻譯的差別界定又會引發另外的難處。

現代中國的案例便觸及以上幾點，但正好就目前語內翻譯的論述來說指出不同的發展走向。首先，郭沫若、顧頡剛翻譯手法極端但卻均獲接受，凸顯近代中國在古文今譯議題上主要聚焦於「古文不可譯」的操作問題，而非當代學界所關切的「是否為翻譯」。尤其相較於二十世紀初土耳其的案例，現代中國不僅不避諱「翻譯」的指稱，甚至積極擁抱此法並專門論述，透露出時人對翻譯有極高的信任感。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在討論時逕以語際翻譯的案例作為對照，顯示對兩種文化行為的高度認同感；但另一方面又強調古今與中外各自的情感距離，以凸顯古文今譯較外文中譯更為可行，且反映兩者間仍有本質上的區別。也就是說，現代中國主觀認定古文今譯確為翻譯，而非文本改寫，然又清楚劃分此「翻譯」與語際翻譯的不同。

此外，其中的「今譯」成分有很大的操作普及性，但又非僅古經典現代化的工具副產品，為另一明顯特色。古文今譯在 1920 年代初的中國即在教育界廣為運用，而非如現代土耳其那般偏向少數專業人士的創作文類。語言改革的背景使古文今譯同時被賦予讀解古文與今文寫作的雙重任務，從官方到民間均二者並重，不分主次。「今譯」於是不單為古文現代化的操作工具，本身的可讀性亦頗有講究，有別於前述希臘今譯古文的教育情況；最後方言采風的案例更進一步顯示現代中國對今譯文字文學性的鑽研精神與重視，甚至展示口語書寫聲音化——也就是所謂符際翻譯——的跨媒介可能。

整體來說，正如 Karen Korning Zethsen 在結論中所強調的，翻譯性質的認定取決於目標文本的形式目的，涉及譯者自身的主觀信念與動機。但需留意此條定義的價值並非在於我們「必須」參考譯者本人及其所屬社群對自身行為的理解，甚至針對「是否必須參考」進行學術性的辯證。語內翻譯的模糊多變，乃至於案例間的彼此矛盾，正有助於提醒我們跳脫「翻譯是什麼」的界線思考，而進一步考量「我們／他們怎麼看待翻譯」；其重點在於將「人」及其所屬社群的整體行為納入翻譯的理論範疇，讓語言的交流、轉化除符碼代換之外更具溫度。最終關於翻譯的跨文化特質，亦不僅限於文本間的互通、再造（即便此「文本」的設定範圍已相當寬泛），而是由外而內反思翻譯「行為」本身的文化差異或共通性。如本文現代中國的案例即至少與土耳其、希臘的古文今譯有諸多可比之處，期有助於歷時性語內翻譯進一步的比較討論，乃至於更上一層提醒我們翻譯論述的更多可能。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丁邦新：《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尤墨君：〈中學國文前途的悲觀〉，《中學生》第 20 期（1931 年 12 月）。

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

〈介紹「大學文選」〉，收入國語日報社編：《大學文選》，臺北：國語日報社，1973 年，書序。

石 鷗：《百年中國教科書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何 容：〈論翻譯古書〉，《何容文集》，臺北：國語日報社，1975 年。

余冠英：〈從大一國文教材想到中學國文教材〉，《重慶清華》第 18 期（1948 年

6月)。

〈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5卷第46期（1932年11月）。

李廣田：〈中學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補救辦法〉，《國文月刊》第28／29／30期（1944年11月）。

周作人：〈古詩今譯〉，《新青年》第4卷第2期（1918年2月）。

林語堂：〈我的話：今譯美國獨立宣言〉，《論語》第54期（1934年12月）。

季羨林：〈漫談古書今譯〉，《群言》第二期（1992年2月）。

若士：〈從一本國文試卷談到中學國文教學的問題〉，《盍旦：文藝、哲學、歷史、雜文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0月）。

范子美（詒誨）：〈序王治心先生古文今譯中國故事〉，王治心：《古文今譯中國故事》，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1年。

施崇恩編：《四書白話解》，上海：彪蒙書室，出版年份不詳。

*胡適：〈中學國文的教授〉，《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年9月）。

胡適：〈國語的進化〉，《新青年》第7卷第3期（1920年2月）。

*胡適：〈國語文法的研究法〉，《新青年》第9卷第3期（1921年7月）。

姜慕先：〈中學國文教材與教法後序〉，《協大藝文》第14／15期（1942年6月）。

徐新建：《民歌與國學——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孫毓蘋：〈論中學國文教學〉，《國文月刊》第64期（1948年2月）。

*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陳爾杰：《「文章選本」與教科書——民初「國文」觀念的塑造》，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姜濤先生指導。

〈專載：初級中學國文暫行課程標準〉，《湖南教育》第13期（1929年11月）。

庶宗：〈聖梵「阿彌陀經」今譯〉，《哲報》第1卷第9期（1922年11月）。

*郭沫若：《卷耳集》，上海：創造社，1923年。

*郭沫若：〈古書今譯的問題〉，《創造週報》第37期（1924年1月）。

郭建勳注譯：《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

- 陶端格：〈兩段古書今譯〉，《國語週刊》第 3 卷第 59 期（1932 年 11 月）。
- 《新式標點四書白話註解》，上海：錦章圖書局，1924 年。
- 曾廣烈：〈盤庚上篇今譯〉，《學術世界》第 1 卷第 5 期（1935 年 10 月）。
- 智：〈古文今譯問題〉，《清華週刊：書報介紹副刊》第 9 期（1924 年 3 月）。
- 滕志賢編譯：《新譯詩經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
- 劉復（劉半農）、黎錦熙：〈論比較文法名稱書〉，《國語週刊》第 4 卷第 87 期（1933 年 5 月）。
- * 黎錦熙：《比較文法》，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錢玄同：〈述幾段古書的今譯〉，《國語週刊》第 3 卷第 54 期（1932 年 10 月）。
- 錢玄同：〈古書今譯〉，《國語週刊》第 4 卷第 100 期（1933 年 8 月）。
- 曉初：〈中學國文教學叢談〉，《教育建設（南京）》第 3 卷第 2 期（1941 年 11 月）。
- * 魏建功（文狸）：〈談文翻白〉，《國語週刊》第 2 卷第 46 期（1932 年 8 月）。
- 魏建功（文狸）：〈談何容易文翻白〉，《國語週刊》第 4 卷第 101 期（1933 年 9 月）。
- 魏建功：〈中國純文學的形態與中國語言文學〉，《文學（上海 1933）》第 2 卷第 6 期（1934 年 6 月）。
- 羅莘田：〈我的中學國文教學經驗〉，《國文月刊》第 20 期（1943 年 3 月）。
- * 顧頡剛：〈盤庚中篇的今譯〉，《語絲》第 11 期（1924 年 1 月）。
- * 顧頡剛：〈金縢篇今譯〉，《語絲》第 40 期（1925 年 8 月）。
- * 顧頡剛：〈盤庚上篇今譯〉，《古史辨》第二冊，北平：樸社，1930 年。
- Albachten, Özlem Berk, (2013)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s modernization of the language: the Turkish case." (語內翻譯作為語言現代化：以土耳其為例) Perspectives 21, no.2, pp.257-271.
-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London: Verso.
- Baker, Mona (ed.) (199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勞特利奇翻譯研究百科全書)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hesterman, Andrew. (1996). "On Similarity," (論相似性) Target 8, no.1, pp.159-

164.

- Chesterman, Andrew. (1998). *Contrastive Functional Analysis*. (對比功能分析)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Chesterman, Andrew. (2007). "Similarity Analysis and the Translation Profile." (相似性分析語翻譯概況)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 no.1, pp.53-66.
- Culp, Robert. (2008). "Teaching Baihua: Textbook Publish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a New Literary Can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教授「白話」：教科書出版、白話文的生產與二十世紀初中國新文學典範的形成)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4, no.1, pp.4-41.
- Culp, Robert. (2019).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 (現代中國印刷的力量：從帝國終結到毛澤東國家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與工業出版)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85). *Des Tours de Babel*. (巴別塔) In: Joseph F.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Transl. by Joseph F. Graham)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165-248.
- Fine, Elizabeth. (1984). *The Folklore Text: From Performance to Print*. (民間文本：從表演到印刷)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ill, Michael Gibbs. (2013). *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林紓「有限公司」：翻譯與現代中國文化的塑造)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kobson, Roman.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翻譯的語言學層面) in *On Translation*, Reuben Arthur Brower,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32-239.
- Kalem Bakkal, Asli. (2019).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Has No Name in Turkey: Conceptual Crowdedness i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語內翻譯在土耳其未獲認可：語內翻譯中的概念擁擠) *transLogos* 2, no.2, pp.48-69.
- Karvounis, Christos. (2022).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Greek,"

- （從古代到現代希臘語的語內翻譯） Katja Abels, Silvia Hansen-Schirra, Katharina Oster, Moritz J. Schaeffer, Sarah Signer, Markus Wiedmann, eds. *Rethinking Translator Education: In Honour of Don Kiraly's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Berlin: Frank & Timme, pp.209-224.
- Kaske, Elisabeth. (2008).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中國教育中的語言政治：1895-1919 年） Leiden: Brill.
- Konar, A. Handan. (2019). "Elucidating or (Un)breaking the Chai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s and Retranslations of Şeyh Galib's Hüsn ü Aşk," （闡明或者（不）解開鏈條？：謝赫·加利普《美與愛》中的語內翻譯與再翻譯） *Studies from a Retranslation Culture: The Turkish Context*, eds. Özlem Berk Albachten, Şehnaz Tahir Gürçağlar. Singapore: Springer.
- Owen, Steven. (2002). "The End of the Past: Rewriting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Early Republic," （過去的終結：重寫民國初期的中國文學史）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s.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and Oldrich Kr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67-192.
- Shang, Wei. (2014). "Writing and Speech: Rethinking the Issue of Vernaculars in Early Modern China," （書寫與言說：重思現代中國早期的白話議題） in Benjamin A. Elman, ed.,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1919* Leiden, Boston: Brill, pp.254-301.
- Zethsen, Karen Korning. (2007). "Beyond Translation Proper—Extending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超越正統翻譯——擴展翻譯研究的領域） *TTR* 20, no.1, pp.281-308.
- Zethsen, Karen Korning. (2009).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 Attempt at Description," （語內翻譯：一個描述的嘗試） *Meta* 54, no.4, pp.795-812.
- Zethsen, Karen Korning and Aage Hill-Madsen. (2016).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ts Place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語內翻譯及其在翻譯研究中的地位——理論討論） *Meta* 61, no. 3, pp.692-70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Guo, M.-R. (1923). *Juaner ji* [The rolling-ear anthology]. Shanghai: Creation Society.
- Guo, M.-R. (1924). Gushu jinyi de wenti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ng ancient texts into modern language]. *Creation Weekly*, 37, 7-11.
- Gu, J.-G. (1924). Pangeng zhongpian de jinyi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middle Cchapter of “Pan geng”]. *Thread of Talk*, 11, 1-3.
- Gu, J.-G. (1925). Jintengpian jinyi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chapter “Jin teng”]. *Thread of Talk*, 40, 1-6.
- Gu, J.-G. (1930). Pangeng shangpian jinyi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upper chapter “Pan geng”]. In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Vol. 2 (pp. 50-63). Beiping: Pu She.
- Hu, Sh. (1920). Zhongxue guowen de jiaoshou [Teach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secondary schools]. *New Youth*, 8(1), 1-12.
- Hu, Sh. (1921). Guoyu wenfa de yanjiufa [The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Chinese grammar]. *New Youth*, 9(3), 4.
- Li, J.-X. (1986). *Bijiao wenfa* [Comparative gramma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Lu, Y. (2022). *Guowen de chuangsheng: Qingji wenxue jiaoyu yu zhishi yanbian* [The genesis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Wei, J.-G. (a.k.a. Wenli) (1932). Tan wenfanbai [Talking about translating classical texts into vernacular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Weekly*, 2(46), 1-2.

臺大中文學報

(第八十六期抽印本)

從語內翻譯看古今文學改革：
1920-30年代中國的「古文今譯」

李 馥 名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九月